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二十五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魏国史话

杨秋梅
著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曾对晋国的历史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家分晋后，魏文侯为了图强称霸，首开战国变法之先河，使之相继在各诸侯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促成了战国盛世的形成，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王灵善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5辑)

魏国史话

杨秋梅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375 字数:300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34-78-4
G·10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毕万奔晋	(1)
二、分晋建魏	(3)
三、文侯称雄	(10)
四、李悝变法	(17)
五、子夏设教	(21)
六、惠王迁都	(26)
七、兵败马陵	(33)
八、强秦灭魏	(40)
结 语	(48)

引 子

魏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不仅有着 280 年的发展史（前 453 年三家分晋—前 225 年被秦所灭），而且也有着悠久的前魏发展史。魏氏自毕万奔晋到魏桓子驹分晋建魏，一直是晋国的一个重要卿族，曾对晋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家分晋后，魏国又是战国初年首先强大起来的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对列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图强称霸，魏文侯首开战国变法之先河，使之相继在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构成了战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画面，促成了战国盛世的形成，也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首先脱颖而出，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

魏国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通过系统地、全面地反映魏国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在三晋国家乃至在战国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弘扬三晋文化的亮点，丰富山西古代文化的内涵，这无疑也将有助于先秦史上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总体构成的认识，同时也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断代史与专门史的研究。

一、毕万奔晋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之始祖是毕公高。毕公高与

周同姓，在周武王灭商建周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被封于毕（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以邑称氏，于是为毕氏。晋献公时期为了巩固君权、壮大晋国，果断地斩断血缘纽带，迫使晋公子们统统出居藩国，这不仅堵塞了晋公族参与晋政的途径，使公室宗族不能充任卿职成为晋国政治的固定格局，而且为异姓、异氏宗族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并进而掌握军政大权提供了大好时机，毕公高的后裔毕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晋国。毕万来到晋国正是晋献公大力扩张兼并的时期。晋献公雄心勃勃，决意要“继文绍武”，振兴晋国，与诸侯争雄。他在全力整顿内政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兼并战争，消灭了众多的周边国家，大大拓展了晋国的疆域，为晋国的百年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献公十六年（前 661 年），晋国作两军，发动了攻灭耿、霍、魏的战争，赵夙为御，毕万为右。当时晋国的军制，国君自为统帅，要御驾亲征，居于战车之中指挥战斗；为国君驭车的人称“御戎”，简称“御”，立于战车之左；执戈盾保护国君与敌兵作战的甲士立于战车之右，因而称“车右”或“戎右”，简称“右”。因两人在战争中建有功勋，战后献公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以为大夫。魏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北五里的龙泉村和柴村之间，也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毕万封魏 11 年后，从其国名为魏氏，这就是晋国魏氏的来源，魏就成为魏氏卿族的发祥地和第一个治邑。

魏氏从毕万奔晋到与韩、赵三家分晋，历时二百余年，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总的发展势头还是

比较顺利的。先秦风俗，事事必先筮卜，毕万奔晋时也曾筮仕于晋，卦象非常吉利，《左传·闵公元年》称此卦为公侯之卦，“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预示着毕氏宗族将来一定能够发展成为公侯之国。《史记·魏世家》亦记载了晋国大夫卜偃的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为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两则故事的科学性不置可否，但在当时对坚定毕万仕晋的信念，以及激励毕氏后人艰苦创业、英勇奋斗起了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然而巧合的是毕氏在晋国的发展前景也正好验证了当初的这些预言。

二、分晋建魏

毕万奔晋就建功受封，这是魏氏在晋国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为魏氏子孙树立了一个典范。魏氏后人不负祖辈之重望，他们前赴后继，建功立业，不仅对晋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使魏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以至分晋建魏，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

（一）魏犇“从亡”

毕万之孙魏犇，号魏武子，骊姬之乱后随重耳出亡19年，辗转翟、卫、齐、曹、宋、郑、楚、秦8个国家，历经磨难，矢志不渝，被誉为文公的“股肱之臣”。重耳回国即位后，“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魏犇被任为文公的戎右。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救宋伐曹，占领曹都之

后，文公为报答当年流亡曹国时曹大夫僖负羁“馈盘飧置璧”之恩，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宅第，有从亡之功的魏犢、颠颉不服其令，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宅第。文公为整顿吏治，拒绝说情，断然处斩了颠颉，罢免了魏犢的戎右之职。

魏犢之长子魏伋，号魏悼子，承袭父爵后，将治邑由魏迁至霍（今山西霍州）。次子魏锜，邲之战俘获了楚公子谷臣，鄢陵之战他又亲手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因此被封于厨（今山西临汾河西）、吕（今山西霍州西）。少子魏颀有拒秦保晋景公灭潞氏之功，被封于令狐（今山西临猗西南）。魏锜之子魏相（吕相），在麻隧之战前有绝秦之劳，被悼公命为下军佐。魏颀之子魏颉被命为新军佐。

（二）魏绛和戎

魏悼子之子魏绛，号魏昭子，谥为庄子，故又称魏庄子，他在晋悼公“复霸”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魏绛是晋悼公政府中的重要成员，先后任中军司马、新军佐、下军佐（晋国军制，中、上、下、新四军递相统属）。他的官职虽未能达到执政卿的地位，但悼公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出自他手，尤其是著名的“魏绛和戎”，不仅使晋国的霸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融合的光辉范例。

公元前569年，北戎中最强大的一部“无终”（今河北蓟县）子嘉父派使臣孟乐到晋国献虎豹之皮，求和于晋。而晋悼公却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之后，提出了复霸必“和戎狄”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主张。

魏绛细陈“和戎”五利：“第一，戎狄是游牧民族，逐水草

而居，他们只看重财物而轻视土地，我们可用财物去换取他们的土地，以扩展我们的领土。第二，边鄙地区没有敌患，百姓就能安心生产，获得丰收。第三，戎狄臣事我国，就会引起四邻震动，使各诸侯国对我国畏威怀德。第四，以德安抚戎狄，不需劳师动众、甲兵受损。第五，鉴于后羿败亡的教训，以德绥诸侯，就会使远近诸侯归顺，国泰民安。”魏绛的建议使悼公大为折服，遂派他“盟诸戎”，并维持和戎政策数十年。和戎政策的实施，首先解除了晋与楚争霸的后顾之忧，使晋长期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后方，得以专事中夏，这就从战略上为制楚服郑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其次，晋与戎关系的改变，加强了反楚联盟，戎还为晋与楚争霸提供了兵力。再次，和戎还促进了华夏族与戎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作用。

魏绛将魏氏治邑由霍又迁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从此安邑一直是春秋时代魏氏发展的策源地和战国前期魏国的都城。

（三）魏舒为政

魏绛之子魏舒，号魏献子，他是魏氏家族唯一的一位正卿，从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至晋定公三年（前509年）任中军帅，执掌晋国国政六年，不仅使魏氏势力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而且“以法尽灭”晋国最后两个旧公族祁氏和羊舌氏，并“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这就把晋国的县由边地发展到内地，设县的途径也由春秋早期的灭国置县，发展为改邑为县，由此晋县的性质也由军事重镇转变为地方行政建制。

魏舒还在晋国军制的改革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公元前541年，晋国与北狄之间发生战争。晋卿荀吴（中行穆子）率师与无终（北狄最强盛的一支）及群狄战于大卤（今山西太原西南，华夏名此地为大原，夷狄则名之为大卤）。因地势险恶，不便车战，晋将魏舒提出弃车战改用步兵作战。步兵在晋国早已产生，是配合车兵作战的，而在此次战争中，不用车兵，纯用步兵。中行穆子的亲信不肯与徒卒为列，魏舒斩首以示众，使得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晋军将新编步兵列为五种阵法以诱狄，狄人嘲笑晋人失常，不待列阵就轻率发起冲锋，被晋军大败之。这次战役，是我国军事战争史上中原各国由车战转向步战的开始。

（四）魏襄子兼并

魏献子之子魏侈，号魏襄子。晋定公时，他与赵、韩、智氏联合攻灭范、中行氏，使晋国由六卿专权变为四卿专权，为日后三家分晋迈出了第一步。

魏襄子之时，晋国的强宗大族就剩下了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六卿为了扩展实力，兼并他族，都采取了巩固根据地、收养谋臣斗士，结缘国外等措施，尤其是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六卿都改革了亩制。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大批汉简中有《吴问》残简九枚，记载了吴王阖闾和将军孙武的对话，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六卿在他们的领地上废除了步百为亩的旧亩制，范、中行是160步为一亩，改革步子最小，韩、魏是200步为一亩，赵是240步为一亩。因此孙武得出：范、中行先亡，智次之，韩、魏再次之，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基本上证实了孙武的预言。改小亩为大亩，目的是要争取民众的支持，适当减轻剥削量，同时也激励民众努力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自己的收入。六卿经过积极地准备之后，他们之间的大火并不可避免地就爆发了。

公元前497年，因为赵氏宗族内部的矛盾引发了一场为时八年的兼并战争，不仅晋国的六卿全部参战，而且东方的齐、鲁、卫、郑、周、鲜虞六国也参与其中。战争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成分之复杂、斗争之激烈，在春秋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公元前497年，晋阳赵鞅向邯郸赵午索要500家卫贡，赵午借故不想归还，赵鞅杀死了赵午，邯郸赵氏叛赵鞅。赵午是中行寅的外甥，中行寅与范吉射为姻亲，于是三家联合起来攻打赵氏。韩氏历来亲近赵氏而与中行氏有隙，魏氏与范氏相恶，智氏嬖臣梁婴父急欲代中行氏而为卿，在共同利益趋于一致的情况下，三家支持赵氏讨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败逃朝歌。第二年，赵鞅率军围朝歌，引起了东方六国的参与。公元前490年，中行寅、范吉射败逃齐国，双方历时八年的战争宣告结束。这场战争结束了晋国六卿专政、六卿并列的局面，形成了智、韩、赵、魏四卿霸晋的格局。

（五）魏桓子建魏

魏襄子之子魏驹，号魏桓子。晋哀公时，他与赵、韩联合攻灭智氏，形成三家分晋、三足鼎立的局面。

消灭范、中行氏之后，四卿专晋使四卿的权力更加集中，为了争权夺利，四卿之间的矛盾很快激化。赵鞅死后，智瑶（亦称智伯、智襄子）继之为正卿，使智氏的势力发展到极盛。智瑶“贪而愎”，公元前454年，他与三家共同瓜分了三

十多年前已归公室的范、中行氏的全部领地，晋出公发怒，欲借齐鲁之师驱逐四卿，反而被四卿赶出了晋国，出公奔齐，死于途中。智瑶另立哀公。

智瑶专横跋扈，想独揽晋政大权，不仅随意废立国君，而且还想凌驾于其他三卿之上，因此无故索地于韩、魏、赵三家。智伯先“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本不想给，谋臣段规谏止道：“不可。智伯之为人，好利残忍而刚愎自用，要是不给，必定会加兵于韩。不如先给了他，使他养成向别国索要土地的习惯，他国若不从，一定会发生兵端，这样韩国就可以免于兵患，那时我们可见机行事。”韩康子权衡利弊，只好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

智伯贪婪无厌，接着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本也不想给，臣下任章献策：“智氏一再无故索要邻国的土地，必使邻国产生恐惧之心，由于共同利益的驱使，他们必定会联合起来；而智氏的要求一再得到满足，则会更加骄横。我们不如予之土地，使其骄横，然后再集诸邻之师共同对付智氏，以避免魏国独自成为智氏的进攻对象。”魏桓子接受了任章的建议，也割万家之邑一给了智氏。

智伯得寸进尺，又派人向赵氏索要土地，遭到了赵襄子的拒绝，于是智氏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氏，赵襄子走保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不下。公元前453年，智氏引汾水灌晋阳，晋阳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在晋阳危机时刻，赵襄子派张孟谈黑夜潜出晋阳，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游说韩、魏。韩、魏两家本来就是被迫胁从于智氏，当智伯率魏桓子和韩康子观看水灌晋阳的情形时，智伯

得意忘形，不觉吐露真言：“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是时安邑为魏都，平阳为韩都，此话暴露了智伯灭赵之后的目标就是韩、魏的真实意图。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智伯的话不寒而栗，在张孟谈的游说下，韩、魏与赵结盟，共灭智氏，智瑶被杀，三家尽分智氏领地，三家分晋完成。三家分晋后，晋公室作为三家的附庸还存在着很长的一段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的合法地位。公元前376年（一说前369年），三家废晋静公为庶人，名义上的晋国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魏氏自毕万入晋，经数代人二百余年的努力，至魏桓子之时，终于分晋建魏，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魏氏与赵、韩三家之所以分晋建国，除了他们自身努力奋斗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晋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为他们的发展图强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晋献公开创的“晋无公族”制度，为异姓、异氏势力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晋无公族，不仅打破了国君系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更重要的是国君的诸公子，除嗣子之外统统都得出居藩国，不得在国内蓄留。晋公子寄寓列国，使君权以下的卿大夫各职不能得到来自与国君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子弟的补充，只能从异姓、异氏中去选拔，这就为异姓、异氏提供了在晋国发展的极好机遇。

其次，自晋文公以来的图强称霸，使晋国的军事实力和领土面积极度膨胀和扩大，为卿大夫的自身强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军事扩张的需要，晋国军队编制由一军扩展

到六军,不仅使军事领导集团大为膨胀,出现一门数卿、数大夫的局面,而且也促使他们获取和发展了属于个人所有的私属武装。随着对外的扩疆拓地,把新兼并的土地封赐给卿大夫,使他们的经济实力亦大为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强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专权提供了基础。

再次,自晋平公之后公室的衰弱、政治的腐败,促使卿大夫势力转而向公室争权和相互之间的兼并。平公时,晋政多门,卿大夫们对争霸再也不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巩固既得利益,相互约束,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这是一个为日后的大兼并积极进行准备的阶段,当六卿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就是六卿之间的大火并,终于酿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三、文侯称雄

魏桓子之子魏斯,公元前445年即位,为魏文侯。三家分晋为诸侯,但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公元前405年,赵、魏、韩三晋联军与齐国大战于廩丘(今山东鄄城东北),联军大胜,次年,又攻入齐国长城。这次战争,使三晋声威大振,周威烈王就在第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三年、魏文侯四十三年(前403),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魏文侯就成为魏国名正言顺的第一代国君。

魏文侯是个极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胸怀

大志，惟才是举，使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汇集于自己的麾下；他思想开放，兼容各家学说之所长，尤其是重用法家思想，首开战国变法之先河，使魏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实现了文侯称霸的宏伟理想。

（一）文侯惟才是举，儒法兼容

文侯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为了富国强兵，他不拘一格从各国网罗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吕氏春秋·举难》载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卜子夏是孔子的高足、著名的儒家人物，被文侯拜为师。田子方，“魏之贤人也”，他以“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的道理劝戒文侯，作为贤明的国君应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不应专注于音律，使文侯深受教益。段干木也是魏国颇负盛名的一位大贤人，魏文侯曾怀着高度崇敬的心情亲自登门拜访他，而他却“逾墙避之”，拒不相见，文侯依然“以客礼待之”，凡乘车过其家门，必伏轼以示敬意。文侯邀请他出任魏相，又被拒绝，文侯再次登门固请，毕恭毕敬地踏进他的家门，以至“立倦而不敢息”，始终站立着和他对话。文侯如此卑身礼敬段干木的事迹在魏国和诸侯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文侯深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的影响，宣扬儒家的信义、仁爱、实行王道政治。

与此同时，他也重用法家人物，放手让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变法。在任用吴起的问题上更显示出文侯非凡的眼光和宽大的胸怀。吴起，因母丧不归、杀妻以求将而受到世人的非议，他听说“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吴起怎么样，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

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文侯不计吴起的名声而命他为将，吴起“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在文侯兼容并包策略的吸引下，儒、法、兵等各家优秀人才汇集魏国，尽其所长，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极大贡献。《史记·魏世家》称赞文侯“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魏文侯自己也说：“自吾友(田)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魏文侯礼贤下士，尤其是重用法家人物，使之成为魏国的变法提供了人才上的准备。

(二)文侯变革

魏文侯即位之初，七雄并立，“下无方伯，上无天子”。七雄之所以能够并立，说明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均势，如果不改变现状，这种均衡状态不可能被打破。然而，奠都于晋国腹里的魏国，晋国春秋霸业的辉煌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最直接最深刻的，加之此时魏国政平人和，社会稳定，因而，魏文侯把成就霸业作为国家的首要奋斗目标。要称霸，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力量，即所谓的“强兵”，军事力量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即所谓的“富国”，也就是说，富国强兵是成就霸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要想达到富国强兵，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法革新。因而，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革，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首先脱颖而出。

魏国的变革是全面的，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变革是

由李悝主持的。军事领域的变革由吴起主持。吴起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训练和考核。考核的标准：身穿三层甲（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操十二石的弓（指弓的拉力，一石约今三十公斤），带箭五十支，肩扛长矛一杆，背三天干粮，半天能行一百里路（约今四十多公里）。凡考核合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宅。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把身强力壮、善于近战的士兵编在一起；把机智灵活、善于爬坡越沟的士兵编在一起；把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的士兵编在一起。在发生战争时，他可以根据敌军的特点以及地形，交互使用或者互相配合使用这些军队，使每个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吴起在魏国创立的这套军事制度，后人称之为“武卒制”。武卒制的实施，使魏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文侯在位50年，四方人才辐凑，各个领域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咨询问策，左右逢源。正是因为有了文侯的信任和支持，李悝、吴起等人在魏国才得以开展变法并取得辉煌的成就。

（三）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在邺地（今河北临漳）实行移风易俗的变革。西门豹任邺县县令后，废除当地为河伯娶妇之陋习，惩办巫婆及贪官，兴建“引漳水灌邺”的水利工程。原来的漳河，因年久失修，一经暴雨，河水猛涨，经常泛滥成灾，地方官就和巫婆勾结起来愚弄百姓，说只要给“河伯”送个媳妇，就会平息水患，安宁百姓。并借为河伯娶妇之名，横征暴敛，肆意搜